散落在三湘大地的时光『信使』

熊其雨



华容县塔市国有林场内一块刻有“圣旨”字样的青石构件，是当年贞节牌坊的旧物之一，其上雕有渔樵耕读等图案。



长沙市雨花区汇城上筑小区附近，有一段用旧麻石砌筑的围墙，石块上多有文字记载。

秋冬季节，湖南地区不少湖汊库港，因水落而使人得以窥见它们的全貌。

在浏阳市洞阳镇洞阳水库，有座建于清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的古石拱桥，今年因水落而显露。该桥为单孔麻石拱券结构，桥身有“飞天蜈蚣”镇水浮雕及题刻。然而，一些越野族开车上桥拍照打卡，由此引发关注。不少网友呼吁，应及时采取警示措施，并将其纳入文物保护名录。

你看是文物，他却视若便道。从此例管中窥豹，可知低级别文物保护工作，任重而道远。

无独有偶，我老家有一座述古桥，桥侧面刻着“华容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述古桥遗址”的公示牌。据考证，该桥建于清光绪年间，由当地乡贤黎昌廷捐建。桥体为花岗石结构，单拱，为南北向，横跨于沟渠之上，四周为稻田。该桥的特殊之处在于，村级公路在桥上经过，这亦是该村通往其他村落的唯一道路。

此前，这座百年老桥因战乱或自然因素，已出现桥基下沉和麻石松动等迹象。令人尴尬的是，受地理位置局限，桥两头与水泥路两端的连接处，均有一个90度直角。如有新司机开车过桥，可能因视觉盲区致拐弯不及时，致车辆不慎落水。

那么，如何做好保护和利用的结合？

11年前，本村青年企业家黎大飞，主动回村捐款两万余元，召集专业施工队，在不破坏桥体的前提下，将拱桥宽度扩宽，在桥面盖水泥“硬壳”，以拉平整体坡度。此外，在桥两头堆置石块，并用水泥进行整体硬化，将原本的90度直角改为超180度的大弯。此举不仅保护古桥，还方便群众日常出行。

这类两全其美的文物“活化”利用，可惜太少了。

老家华容县塔市驿，原为长江入湘后的第一个千年古驿，街上原有一座槽门屋（一种带槽门的宅院入户大门。所谓槽门，指的是建筑正立面外墙中间部分向内退后，由此形成一个内凹的槽形空间大门，因此得名槽门），为本地万氏家族所建。

我走访其直系后人得知，这座宅子系出生于清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的万年懋于清中叶时期出资修建。万年懋曾诰封奉直大夫，享受从五品官俸禄。据乡邻回忆，这屋属徽派建筑，门口有麻石狮子，两旁有一对青石质石鼓，椽檩上覆青瓦，横木上有精致的手工木雕图案，取材于京剧传统剧目《玉堂春》。推门进院，可见圆立柱，下方有青石磉礅，抬头可见一方戏台，还有14方天井，房屋至少有40米进深，是典型的清朝古建筑。然而，受特殊年代影响，这座老房子只剩地基和残砖败瓦。一些有动物或植物图案的雕花麻石、青石等，其年代疑可追溯到明朝时期，如此好物，却被当地一些群众搬回家挪作他用，用来晒豆瓣酱或做花盆凳基。

我老家村里有座祀奉文天祥的百年庙宇，庙内原有一尊铜质观音像和一尊铜质财神像，为当地一高龄文姓老人捐赠。老人声称，自己就是文天祥后人，而这两尊铜像，本在其文氏家庙中祀奉。特殊年代里，老人冒险将其藏起，轻易不肯示人。如深究铜像的历史，至少已逾百年。然而，10多年前的一天，庙内负责人发现，这两尊铜像竟被偷走。不久后他发现，那尊观音铜像竟又出现在原位。好景不长，这尊铜像几年后再次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尊瓷像。本村一位村民透露，行窃之人为本村一玩物丧志的年轻人，第一次偷走将头像带去变卖，他人知道此物受过“香火”果断拒绝。年轻人卖而未果，迫于无奈又辗转将其还到庙里。

一座立于路边的古庙，承载着的是当地的民间信仰。最现实的问题是，庙内如今只有一人“兼职”，既无监控，也无其他安防设施，而这些历经百年沧桑的老物件，就这样摆在那里。可以大胆想象，在广袤的农村大地，这些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或低级别文物，其数量之庞大、分布之零散、管理之真空。比如，前文所述的古建筑，从文化传承功能来看，对研究湘北地区宗祠文化、建筑设计和民俗风情等方面，将是大有裨益的。

还有一些远在深山的文物，无形中受了“偏僻”的保护。老家的小墨山下，有文天祥的偏室金夫人墓。《湖南十三府文氏源流概况》记载：“华容小墨山文氏，文天祥之孙寿四郎（十一世）寻扫天祥偏室金夫人之墓，见华容东乡山清水秀，土地肥沃，约元至顺年间从江西吉安迁居塔市驿小墨山。”这位夫人离世后，葬于荆江之阳、弹子山东南的陶沙垄贯底湾天鹅食谷山。在文氏后人的指引下，笔者曾数次入深山寻访这座古墓。当地的文保部门不刻意去做过多的宣传，也不专门悬挂文物保护标牌，可能是对这座墓葬的变相保护；但从辩证角度说，如能发挥历史名人效应，将此座古墓升级为文保单位，或许又能获得意外之效。

在长沙雨花区跳马镇，青山绿水之下，竟埋藏着明吉王（明长沙城的藩王）王室墓群。许多年前，我曾听朋友讲过一个故事：一位奶奶屋后的方形水井上，曾盖有一块长约2米，宽0.9米的青石板。有一年修村级公路时，其屋旁山脚下的泥土被运走做路基，一座古墓重见天日。这位奶奶和丈夫钻进古墓中，拖出两块青石板。其中一块，被她盖在水井上，另一块被盖在了沟渠上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这块盖在水井上的石板，原本竟是其中某座王陵的墓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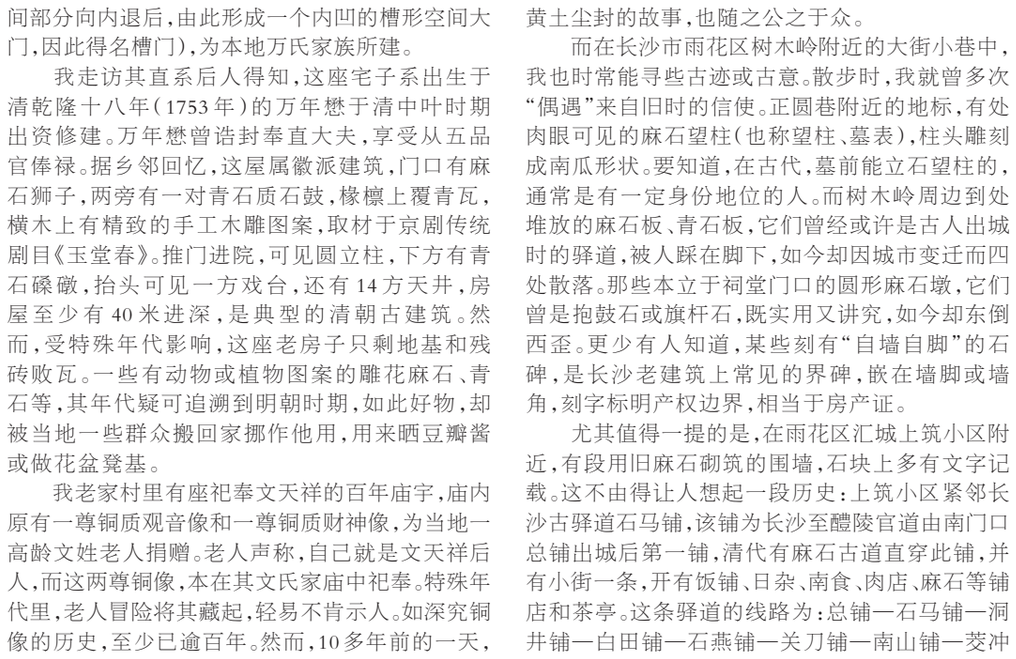
我由此想起，每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时，老家的众多山林中，总有些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古碑，从其字迹来看，其主人大多来自清朝。这些深藏林木间的家族墓地，昔日因交通不便而远在深山，如今，随着道路交通和通信网络的日渐发达，这些被落叶和黄土尘封的故事，也随之公之于众。

而在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附近的大街小巷中，我也时常能寻些古迹或古意。散步时，我就曾多次“偶遇”来自旧时的信使。正圆巷附近的地标，有处肉眼可见的麻石望柱（也称望柱、墓表），柱头雕刻成南瓜形状。要知道，在古代，墓前能立石望柱的，通常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。而树木岭周边到处堆放的麻石板、青石板，它们曾经或许是古人出城时的驿道，被人踩在脚下，如今却因城市变迁而四处散落。那些本立于祠堂门口的圆形麻石墩，它们曾是抱鼓石或旗杆石，既实用又讲究，如今却东倒西歪。更少有人知道，某些刻有“自墙自脚”的石碑，是长沙老建筑上常见的界碑，嵌在墙脚或墙角，刻字标明产权边界，相当于房产证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雨花区汇城上筑小区附近，有段用旧麻石砌筑的围墙，石块上多有文字记载。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段历史：上筑小区紧邻长沙古驿道石马铺，该铺为长沙至醴陵官道由南门口总铺出城后第一铺，清代有麻石古道直穿此铺，并有小街一条，开有饭铺、日杂、南食、肉店、麻石等铺店和茶亭。这条驿道的线路为：总铺—石马铺—洞井铺—白田铺—石燕铺—关刀铺—南山铺—茭冲铺—龙头铺，最终抵达醴陵。那么，这些麻石是否就来自数百年前的那条古驿道？

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，这些麻石、青砖或老建筑构件，常常以散落的形态出现。在合适的契机下，是否某个民俗博物馆，能巧妙融入老物件、老建筑等主题陈设，展示不同时期的民俗风貌，讲述时代的故事与回响呢？

文物历经时光洗礼，不分高低贵贱，我愿他们都能在当下，找到最适合的归宿。



华容县述古桥遗址。

乡野间的古建筑，需要“赛博永生”

苏遥看



江永县桐口鸣凤阁。

与追求永恒的西方石构建筑不同，中国木结构建筑从建立之初便已预料了其消亡，是有寿命的建筑。木构建筑保护本质上就是在与时间对抗。

上个世纪末以来，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，人去屋空之后，古建筑因无人维护，迅速朽烂——漏雨导致梁架糟朽，白蚁蛀蚀掏空结构，自然倒塌的速度远远超出预期。

与此同时，失去人烟的村落成为盗贼的目标。精美的木雕、砖雕、柱础、石鼓、石狮等建筑构件由于无人看管，频频被偷盗，流入市场。一些保存尚好的古宅被整体拆解，沦为私人会所的装点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尊重原貌的完整复建，而是将来自不同建筑的构件以及一些当代的机雕雕花构件，强行缝合成一座建筑，而被拆卖的建筑原址一地鸡毛，传统村落的文化肌理由此遭受毁灭性打击。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还未来得及得到法律上承认的文物身份。

古建筑活化向来是保护工作中的一大难题。建筑一旦失去人气，便会迅速走向衰败倒塌，因此活化利用本是延续建筑生命的重要途径。然而，活化之路困难重重：传统建筑的空间布局围绕宗族家庭生活展开，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。古人设计的建筑格局与空间利用方式，也难以适应现代生活的日常需求，电线、网线、上下水管网等基础设施难以妥善安排，消防隐患也更为突出。出于防止火灾、避免损坏文物原始信息等考量，有关部门设立了较为严格的保护标准，这虽属必要，却在客观上进一步压缩了活化的空间。保护与利用之间，由此陷入两难。

例如，许多祠堂常被作为村落中的公共活动室，村民在其中安装空调、观看电视、牵引水电，进行演奏乐器、打乒乓球、喝茶聊天等日常活动。但水电线路的引入又给建筑本体带来安全隐患，部分活动也会对建筑造成损坏或改变内部原有布局，违反了文物保护标准。因此，许多古建筑晋级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后，保护标准与活化利用存在冲突，反而无法得到活化，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。严格遵守保护标准下的建筑活化困难重重，可实现的功能极少。失去活化的建筑，往往直接关门了事。而一旦失去使用，室内空气不流通，木构件也更容易糟朽，建筑又会因缺乏人气而加速衰败，陷入新的死循环。

除保护标准之外，防盗考虑也成了许多建筑闭门谢客的原因。但一座已被多次盯上的建筑，闭门无异于掩耳盗铃，并不能杜绝盗贼，村民若日常在祠堂内部活动，也相当于做了日常巡检工作。长期闭门，构件被偷反而更难发现。每日有人在其中活动的建筑，一般来说相对不易被盗。

近十年来，我调查了闽、粤、桂、湘、赣等省区未核定保护级别建筑。对于以上困境可能采取的对策，我试着加以探讨。

方案一：土地置换。若村民执意拆除某古建筑，可在原址保留该建筑，由住建部门或乡镇集体另行批地重建祠堂或庙宇。但此方案有明显漏洞：一是村民对原址有风水执念，难以接受异地保留；二是村里可以作为新建祠堂的建设用地指标其实不多。三是建筑留在原址，后续仍可能面临倒塌和荒废，无法根除问题。

方案二：易地集中迁移保护。该方案虽广受诟病，但现实是，许多乡土古建筑已成空壳，周围村落肌理和自然风貌早已遭受巨大破坏；部分村落因空心化，建筑失去日常维护而快速损毁倒塌。

易地集中迁移保护有其优点：集中迁建可营造良好的建筑风貌展示；若每个地级市划出一块安置区域，可成为古建筑博物馆和启蒙教育基地；能摆脱原生环境中的部分风险。但又存在五大难点。一是需有安置土地，可能只能安排在偏远山林，或迁入大学校园、景区；二是需建立合理的评估系统与懂行的专家团队，判定迁移价值及可能的损耗；三是专业迁建团队目前国内尚少；四是迁移的过程中，古建筑原始信息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损坏；五是成本高昂，许多古民居迁入景区后作为博物馆，因不收门票而难有经济收入。

现实中，绝大部分民众未形成正确的文物意识，将古建筑仅视为功能建筑或旧物，缺乏历史价值认知，一些村民自发更新，自主推倒古建筑，于原址新建仿古建筑。此外，大量高价值建筑还游离于法律保护之外，面对破坏力有不逮；“修旧如旧”理念的普遍误解，使保护工作难以落地，一切建筑被“修旧如新”，原有历史信息被覆盖或清除；地方传统营造技艺快速被同化消失，本土建筑风貌面临同质化威胁，而保护手段尚缺乏有效创新与制度支撑。

在中国，好的建筑如繁星般密布于乡野，如此众多却又如此脆弱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学术界长期将目光聚焦于北方官式建筑与高古遗构，导致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乡土建筑研究长期滞后。永州、宜春、抚州、潮汕等古建筑高度富集的区域，至今仍存在大片研究空白。

与此同时，如山西、徽州等地的建筑研究却日趋饱和，许多并非安徽本省的高校，仍习惯性地选择黄山作为建筑院校学生测绘实习的基地。这种研究力量的分布失衡，与乡土建筑消亡的速度形成了残酷的对照。许多建筑尚未被系统调查和记录，便已在推土机下化为瓦砾，或在荒草中悄然倾圮。我们甚至来不及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，更遑论研究其价值。一座古建筑的消失，带走的不仅是木材与砖石，更是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、一个区域的审美意趣、一段地方史的实物见证。而这样的消失，正在广袤的南方乡野间静默地、加速度地发生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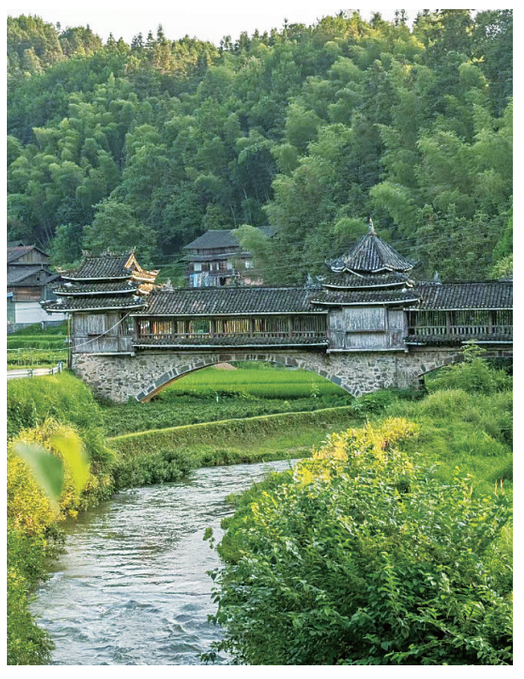
但这也不代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文物爱好者主动寻访散落在乡野间的古建筑遗珍，拍摄影像，奔走呼吁；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也开始为乡土建筑建立数字化存档，高校研究者目光也终于开始更多地投向乡土建筑，陆续展开测绘与建模。将现实中越来越难容身的古建，保存在虚拟的数字空间。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文物数字化便显得尤为紧迫。文物数字化并不是什么很高大上的名词，从使用手机相机按下快门这样最简单的图像拍摄，乃至更进一步的精细测绘、扫描建模，都可以让这些建筑实现某种程度上的“赛博永生”。即使有朝一日建筑本体消亡，我们仍能为华夏文明曾经创造过的这些瑰宝留存一个切片，让后人知晓：原来这片土地上，曾存在过这样的建筑。

古建筑为祖先曾经创造的辉煌留存证据，为艺术续存火种，这或许是我辈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或许，你可拿起手中的手机和相机，让那现实中终将消逝的古老建筑，在这片土地上永存。

以存在，对抗虚无；以记录，对抗遗忘。



通道侗族自治县中步三桥。



江永县石枧隐峰观，现状接近于荒废。

本版照片均为作者供图